

※ 柯慶明教授紀念專輯 ※

豪華落盡見真淳

張文薰*

臺大將在柯慶明老師主事之下成立臺灣文學研究所——得知這消息時，我已經在東京唸博士。我於九十年代進臺大中文系唸書時，與臺灣文學有關的課程只有現代小說、詩、散文三選一，但都不是由柯老師授課。而雖然柯老師少時就以「黑野」與本名從事創作，接下《現代文學》主編前後更與當代臺灣文學、藝術創作者締下因緣。然而，在知識界擘劃一個公眾存疑的專業領域，所需要涉及的考量與耗費的精神，這與在大學內成立一個研究教學單位，畢竟是不同的。是什麼讓心在林語堂《生活的藝術》般「以傳統文化的風雅救濟當代文明的荒涼」，與志於肩挑梁啟超《飲冰室文集》般「融會東西文明再造『新民』」擔負的古典文學研究者，一腳踏翻臺灣文學的塵世路呢？

一開始的猜想，是一九九四年的「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國際學術研討會」。那場日治作家、國內外學者冠蓋雲集的會議，雖由清華大學主辦，但柯老師與主事的陳萬益、呂興昌二位教授早從學生時代，就在中文系的「文學討論會」中因臺灣文學而結緣、親如兄弟，因而也在籌辦會議時扮演了重要角色。會議後，臺灣文學系所陸續成立，具指標性意義的臺大，卻是在二〇〇四年才正式招生。這時間落差，象徵在臺大設立嶄新學術單位之不易。十年之間，臺灣經歷首次政權輪替的劇烈變化，柯老師更身為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的成員；然而一位以王維為始、視古典詩文為民族心靈記憶的書生，如何在學術生涯的後半扮演了治臺文所與國文課綱的叛逆哪吒角色？

後來才知道，柯老師是承張亨教授在系上的倡議，才慨然接下這讓他自詡「長期陷入跨單位教學、服務的拉扯，因成為合聘教師，領一份薪水，卻得做兩份工

* 張文薰，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。

作，盡雙重義務」的差事。但在我們小輩看來，這苦差事卻宛如天命。柯老師在古典文學批評、美學論述卓然成家，其立論起點、思維框架卻絕不否認經驗的重要性——這正承續了兼融思想與文學、通古今究天人的張亨教授之道。志在統合中西文化思想的古典學子，就這樣走進紛亂的臺灣現代社會。從明星咖啡屋騎樓的周夢蝶、《新潮》到《現代文學》編輯重任，柯老師的學術生涯從來不只在書篋卷軸之內，都市角落、印刷排字、作家與媒體，都是其文化參與的第一現場。臺灣文學批評論述始於大學時代一篇關於朱西甯《鐵漿》的報告，這篇從姚一葦譯註《詩學》得到啟發，轉接西方悲劇理論，討論現代臺灣小說底層民眾形象的論文，同時獲得系上教授與作者朱西甯的肯定。以〈《鐵漿》論：朱西甯的小說藝術〉中的「血氣英雄」論為起點，轉化亞里斯多德《詩學》三取徑為「情性的本質」、「奮鬥的意義」、「形象的塑造」等以「人類精神」為核心的「悲劇英雄」理論。在柯老師對司馬遷、曹雪芹與朱西甯小說的闡述下，敘史、小說都找到了對應卻不硬符於西方的「天」、「命運」、「荒謬」、「意志」的表現；這種融合西方理論於中文古今作品的評論取向，可以說開啟了臺灣文學研究領域以比較為方法的基石。

〈臺灣「現代主義」小說序論〉則是對於臺灣小說評論、文學史觀的綜論。雖看似以「現代主義」為題，但正如談朱西甯、白先勇、林亨泰、白萩作品的關懷與方法，都是從臺灣社會的現代性命題出發，而兼及鄉土文學、寫實主義等面向一般，這篇論文可視為柯老師對於臺灣文學的整體關照——聚焦於新與舊、中與西、傳統與現代、破壞與超越等二元價值尖銳對立的一九六〇年代爆發的現代主義；舉出關鍵意象如火車、情節如戰爭、情緒如失根、問題如性愛，而歸結到倫理與存在意識錯位的現代文學母題。如果我們接受柯老師強調的，文學是凌駕二元對立結構的「世界外世界」的主張，那麼六十年代（甚至迄今）對於現代主義之擁抱與拒絕，其實都是臺灣人心靈在紛雜政治、繁冗制度交織而成的世界中的具體行動，接續古典詩詞意象、援用西方名家字句，表現為歷史情境中個人「斷裂」與「孤絕」的詩意感受。與這篇綜論規模、關懷相似的是〈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？〉一文，當時因應籌劃「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」的齊邦媛先生之命而寫，主要使用的材料是現代詩與詩論；後來更因白先勇先生的建議，促使柯老師將自己「就近觀察」的親身經驗化為嚴謹論述，於二〇〇四年東京大學與中研院文哲所合辦的「二十世紀臺灣文化綜合研究學術研討會」中報告成文。從「四十年來中國文學」到「二十世紀臺灣文化」，臺灣社會的生活經驗與中文系的學思傳承，同行夥伴的加入，適足

以讓柯老師揮動羽翼，引領一個結合語言、思想、歷史、文學訓練的嶄新單位而飛翔。

也是在二〇〇四年的那次會議上，大學畢業後就出國的我才正式認識了柯老師。在臺大中文系就讀期間，我因為分到雙數班，只有在張淑香老師的「文學概論」、「詩選」課上，看到不時會從共同教室走廊上探頭進來的柯老師。會議過程中，柯老師對於我的報告內容——一九三〇年代臺灣日語文學多有指點，老師涉學廣博，幾乎任何主題都可以評論。之後，與會者參觀東京近郊的「澤乃井」日本酒藏，擔任導覽口譯的我缺乏製酒相關知識，臨時以「淳味」翻譯日本酒風味成分的「うまみ」，柯老師特地來說：「你這個譯法沒錯，就是『豪華落盡見真淳』的『淳』。」我畢業回臺後先在臺大兼任，位於普通教室後方的舊地理系館是臺文所第一個基地，高闊的天井緩緩擺動著吊扇葉片，無論清晨或深夜，我總能因為老師那與體重不成比例的輕快腳步聲而心安。

柯老師常持贈書籍與果子餅乾，哺養所有臺文所中人。老師贈我的第一本書是岡倉天心《茶之書》——與林語堂一樣，在英語世界體系中介紹東方生活文化的精髓之作。會通中西文化思想——受教於張亨、殷海光的柯老師以及無數近代文人之志，是否在能在海島臺灣的經驗世界中證成？寫成於退休後的《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》看似回歸古典，但其研究契機更在於開拓臺大圖書館所藏的中國、臺灣碑帖拓本的學術價值；老師多次強調，這是臺文學子可以致力的領域，只是「沒有人做，那就我來吧」。如果「對文學作品的『美感』或『美學特質』的探討」是柯老師懷抱終身的研究初衷，那麼碑銘狀記、意識認同、制度資本等文體分類或主題法則，也都是抵達會通中西古今海陸的文學之美的路徑而已。更重要的可能仍是「表現一個完整的對生命的真實感受」的經驗性意義，殖民經驗、冷戰經驗、當代科技爆發的人際經驗、碑帖傳記上的生命經驗，在美感表達形式前都應是等價的，否則再多的描述文字「只是一堆詞藻而已」。

柯老師病後開始使用臉書，其貼文內容頗有風解今事之意，但據其說法，多非新文，而是將以往的手札打字貼上，用來保持手指的靈動；也正多虧臉書平臺，使除了上課時間外少在校園現身的老師，得以重回大家表達想法與吐露絮語的日常社會。有一次，我貼了一段日中對照的文字：「智理至上，失之圓滑；情意至上，心無定向；意志至上，索然無趣。」老師回應：「智、情、意都是人心不可或缺的面向；孤立而論似皆有弊無利；其實智以觀之，情以感之，意以成之，何必分割？」

似乎在提點我不須刻意將心智感知分類，來理解內在精神的結構。其實那是我為夏目漱石《草枕》開頭所試作的拙譯。柯老師與夏目漱石的思想基礎都在本國文史傳統中萌生，知識養成的青年階段受西方人文思潮訓練（用柯老師自己的說法「整個感性不免都是『現代』傾向的」），更在冷戰秩序、明治維新的世變中與「現代」交手。夏目漱石捨棄大學教職專事創作，柯老師反之，在文學研究教學中燃燒「黑野」直到豪華落盡，輝光厥存。